

告別杜思妥也夫斯基？晚期巴赫汀思想的 空間語藝觀與其時間／實踐性

王孝勇*

投稿日期：106年8月5日；通過日期：107年1月2日。

* 王孝勇為靜宜大學大眾傳播系副教授，e-mail: hywang2@pu.edu.tw。

本文引用格式：

王孝勇（2018）。〈告別杜思妥也夫斯基？晚期巴赫汀思想的空間語藝觀與其時間／實踐性〉，《新聞學研究》，136: 185-222。

DOI: 10.30386/MCR.201807_(136).0005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推敲晚期 Bakhtin 自歌德「教育小說」中所提陳揭示的空間語藝觀與其時間／實踐性。首先，透過摸索 Bakhtin 如何從盛讚杜思妥也夫斯基複調小說的對話性，轉而婉言質疑其理想言說情境的困境，本研究指出「從自我到社會」、「從時間到空間」實乃晚期 Bakhtin 轉向歌德研究的理論脈絡。接著，本研究藉由批判性地閱讀 Bakhtin 論及教育小說的經典專著，勾勒演繹其間的「時間匯聚」與「空間打造」之雙迴圈機制，及其所結晶醞釀的「時間視覺化」與「成長迸生性」之空間語藝觀。基於研究發現，本研究將指出晚期 Bakhtin 的思想實乃飽含階段性策略戰略思維的語藝洞察。晚期 Bakhtin 既有歷史感又有未來性的空間語藝理論，其最關鍵的意義，在於它確實將語言的社會改革與實踐性置於「對話」的位階之前或之上。

關鍵詞：巴赫汀、成長迸生、空間語藝、教育小說、跨性別、複調小說

壹、前言

晚期 Mikhail Bakhtin 的思想至今仍為國際相關學術社群中，最常被片段理解、簡化以對，甚至略過不談的語藝實踐。這一方面是因為 Bakhtin 自 30 年代就小說話語 (discourse in the novel) 如何不同於史詩 (epic) 獨白，寫就了擲地有聲、享譽世界的多篇鉅作，¹ 使其站穩了當代經典思想家的一席之地。這也迫使後續追隨者欲捕捉大師恢弘精深思想體系中的一點靈光，必得優先考量其複調小說 (polyphonic novel) 理論。另一方面更是因為晚期 Bakhtin 透過德國寫實派作家歌德 (Johann Goethe) 的創作所開啟的「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 novel of education)² 研究，實乃起源接續於其複調小說研究大放異彩的同一時期和脈絡。³ 因緣使然，縱使 Bakhtin 在適逢此一柳暗花明、否極泰

¹ 這些研究論著的英譯文版，由 Michael Holquist (2002b) 收錄於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一書。書中四篇論文寫於 1930-40 年代初期。當時 Bakhtin 因蘇聯史達林「大肅清」(the Great Purge) 的統治被逮捕，並指控其思想有明確的「反政府傾向」。隨後 Bakhtin 與其妻子被流放至哈薩克等極北苦寒之地，直到 70 年代才在俄國知識界與年輕知識分子重新看見其思想價值並積極提供協助與援下，重返莫斯科的生活圈與文化圈。中文論著對 Bakhtin 此一時期和思想發展的討論，請見王孝勇 (2016a)。

² 「教育小說」在西方文學中，有獨特的敘事內容和風格。其主題多半是主角思想和性格，在經歷人間百態、挖掘人生意義、探訪人生哲理過程中的發展 (陳長房, 1994)。而歌德被視為是「教育小說」創作類型的代表人物。歌德筆下角色的意識形構，更直接影響了晚期 Bakhtin 所述的「時間視覺化」與「成長滋生」。本研究在第三部分探討相關概念。

³ 事實上，Bakhtin 「複調小說」的研究，自 20 年代開始，直到 1930-40 年發展成熟，自成一派之言。有趣的是，Bakhtin 對歌德的關注同樣始於 20 年代。在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這本鉅著中，其中更有一篇文章 “Forms of Time and Chronotope in the Novel” (2002；寫於 1937-38 年間) 以稍短的篇幅論及歌德

來的晚期生命歷程之際，他的學術耕耘早已從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的複調小說研究轉向歌德的「教育小說」，但人們仍傾向將晚期 Bakhtin 的思想視為前期的重複再述或些許擴充，而非相當程度的質變——當然，這樣的質變並非翻天覆地的，而是在延伸中確見轉折變貌的。

對此，持「重複再述論」的論者主張，主體和歷史意識的生成本就是每日言談的言說類型。因為言談中的他者性（otherness）在同一個「共在」的對話時空中對於主體性形構的影響，乃是必然且自然的，而這是 Bakhtin 自早期哲學—美學階段就關注的新康德主義命題（Holquist, 2002a）。⁴ 持「些許擴充論」的說法則認為，由於 Bakhtin（2004a, p.

的「教育小說」如何重塑歐洲「田園詩」（idyllic）的傳統。該文前半段對於歐洲自古典時期到中世紀的小說「時空型」（即時間與空間在文本中的關聯性）加以考察和分類，甚至與晚期 Bakhtin（2004b）在其歌德研究的代表作“*The Bildungsroma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Realism*”，有著相當程度的呼應甚至重疊。然而，不同於複調小說理論約略於 40 年代建構完整，Bakhtin 針對「教育小說」和歌德的研究書寫一直持續進行，直到 1960 年間。同時間 Bakhtin 已開始轉向「人類科學」（2004a）的問題意識化以及狂歡節民間節慶儀式的分析（Bakhtin, 1965/1984）。對此，本研究認為，教育小說研究確實可以視為 Bakhtin 醞釀自 20 年代、於 1930 年間開始發揚揮灑的其中一個研究主題，且與複調小說的研究路徑互相輝映。但相較於複調小說研究所揭櫫的語言觀和對話觀，Bakhtin 對於歌德的書寫呈現確有焦點轉折和立場變遷。而這與歌德本身的獨特性亦有所關聯（此點正文旋即論及）。綜上所述，本研究所述的「晚期 Bakhtin」，就時間的斷點和思想家自身思維體系的脈絡而論，係指 Bakhtin 自 30 年代開始直到晚年的歌德研究路徑。

⁴ 本研究採一般對於 Bakhtin 思想體系的三階段分期，即：早年的哲學—美學階段、1920 年間的語言學轉向階段，以及 30 年代以降以小說敘事為核心、眾聲喧嘩為主旋律的文化理論建構階段。這主要參考自劉康（1995）的說法，更顧及康德思想對 Bakhtin 帶來的啟發與反思。Bakhtin（1993）早期延續康德對於人類主體性的關懷，但棄置康德的超驗哲學觀（因此人稱早年 Bakhtin 為「新康德主義」，標示其源自康德卻又與之相異的事實），旋即改從日常對話的脈絡化和主

155) 曾坦言：「我喜好使用不同或異的詞彙描述單一現象」，因此論者順水推舟地主張他晚期的視野相較於過去，可謂開闊宏大，「既是在總結他的人生經驗，又是在講述普遍意義上的語言歷史和人類理解自己、理解世界的歷史」（劉康，1995，頁 74）。上述兩種說法皆看似言之成理，也凸顯了 Bakhtin 思想體系本身的一貫專注。

然而，晚期 Bakhtin (2004b) 在歌德教育小說的研究中，卻提出了三點極為重要又特殊的宣示和立場，值得玩味再三。其一，不同於複調小說研究時期將小說等同於民主化實踐且大力頌揚、而史詩則得類比為僵化教條和極權主義且欲除之而後快，晚期 Bakhtin 相當令人詫異地提出了「將小說含括於史詩之中」（p. 43）、「在小說與新史詩之間……建立新的時空感，使得藝術形象產生根本的改變」（p. 50）等說法，無奈這點至今並沒有引起後續研究者的關注。其二，不同於複調小說研究從小說相對自由活潑的內在文本虛擬空間，想像地諷諭外在政治局勢的困頓閉鎖（一般認為是 30 年代俄國的史達林統治；或是形式主義文學正典的真理位階；見 Bialostosky, 1998; Perlina, 1988），晚期 Bakhtin 在討論歌德（Goethe, 1816/1962）筆下的《義大利之旅》（*The Italian Journey*）時曾多次使用“realism”和“realistic”等語彙，而這兩個字少見於他之前的書寫結晶中（Tihanov, 2000），⁵ 直至 Bakhtin

體化切入提陳對話論，事實上是貫穿其一生的理論志業（王孝勇，2012）。也正是由於 Bakhtin 對於「互為主體性」的看重，牽引著他自 20 年代開始就在論述中展現某種程度的「空間語藝觀」，亦即表述在與先前、他人、後續表述的互動平台地景（landscape）中，才得以賦有意義（Tihanov, 2000）。而歌德也於此時稍晚，開始成為 Bakhtin 學圈受到重視的研讀對象。

⁵ Bakhtin (1963/1984, pp. 60-61) 確實在複調小說研究中，說杜氏「自我認定」為 realist。不過在那裡，所謂的寫實主義乃是為了跟獨自主義、浪漫主義的文學書寫方式進行對比，藉此提陳互為主體性的主體形構生成。這跟晚期 Bakhtin 從意識形態鬥爭的外在對話性（outer dialogicity；即語言意義的運作不僅是政治社會開

(1965/1984, 1994b, 1994c) 在晚期另個與教育小說研究互相輝映的狂歡節文化儀式分析中，才以「怪誕寫實主義」(grotesque realism) 此一專有名詞體現。這更顯得教育小說研究在 Bakhtin 的思想體系中，恐難單純被視為前期的繼續或些許延伸，實乃具有承先啟後的轉折與關鍵位階（但並非取代或否定前期）。其三，不同於前期考察自古希臘羅馬以降的小說敘事如何對於「人的形象」(image of the man) 加以文字圖像化、美學視覺化的「時空型」(chronotope) 系列研究中，Bakhtin (1994a, p. 184, 2002, p. 86) 曾宣稱「以時間為本、空間為輔」的路徑方得適切地探討文本中時間與空間的不可分割性，到了晚期 Bakhtin 的筆觸流轉間，他(2004b, p. 24) 則多次直白交代「空間已凌駕於時間之上」，而吾人更可透過各種可見的、物質性的視覺部署「在空間中回看時間」(同上引, p. 30)，據此摸索人類主體與世界體系的「成長迸生」(emergence)。⁶ 在此，人與主體意識的生成係與「真實的歷史時間」(而非小說或複調小說的虛擬時空) 呼應同化，自由、未來、烏托

放變遷之索引記號，更有抵抗、解放的關鍵意涵) 烘托 realist 或 realism，實乃有相當的差異。

⁶ 本研究將“emergence”翻譯為「成長迸生」，大致有以下幾點理由。首先，臺灣現行期刊論文中的譯詞，大致有：出現、興起、冒出、現身、突現、誕生、產生、建構、表現等。這些語彙在各自論著的書寫中自有其價值，但大多偏向「由無到有」或「穩定延續」的指涉。此舉與 Bakhtin 欲透過歌德論述一種既關乎主體觀又體現世界觀重塑的語藝實踐和語言條件，有實質的差異。更有甚者，前述諸多論著在使用“emergence”時，並未將其視為有待被問題意識化的概念。此外，臺灣唯一論及 Bakhtin 教育小說的學術著作，乃係王得宇(2016)的碩士論文。他將歌德作品稱為「成長」小說，而“emergence”譯為「迸生」，並從 Bakhtin 的「時空型」和對話性的理論整合視角分析香港作家董啟章的自然寫實主義筆法。王得宇的書寫清楚可見 Bakhtin 歌德研究實則探索「時間—空間」裡，人類主體性變化生成的真實樣貌和社會空間環境的變數。因此本研究在翻譯上借用王得宇的說法，僅在顧及書寫慣性上做出微幅調整。亦即採取「教育小說」的文類命名，以及「成長迸生」的修辭術語。

邦、時間行進……方得以企及。

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 Bakhtin 針對歌德教育小說的研究確實在某些問題意識和批判視野上或異於複調小說研究。在此，Bakhtin 選擇暫時揚棄小說與史詩的文類差異考究，改以對話與主體成長迸生的情境脈絡和空間場域作為分析的基礎；接著強調歷史不同階段的時間序列和主體意識，得以清晰可見、具體而微地展現分布於空間的律動運轉（而非死寂靜默）和創意行動中。最後，晚期 Bakhtin 終於到抵了他自早期康德哲學研究、中期馬克思語言哲學階段皆縈繞於心的抵抗、再意義化（resignification）、再脈絡化的政治願景與寫實命題（王孝勇，2009, 2011, 2012, 2013）。也就是說，透過對空間視覺性、物質寫實性及其得以迸生社會改革潛力的強調，晚期 Bakhtin 試圖架構出既延續過往關懷但又有相當轉折變化的空間語藝理論，藉此一方面回溯性地探討對話主體建構過程中的眾聲喧嘩與其時間匯聚歷程，另一方面又折射出幾近於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干預政治（interruptive politics）的空間打造藍圖。對此，本研究擬從「空間語藝觀」（concept of spatial rhetoric）切入並探索此一 Bakhtin 思想體系中，至今仍鮮有人跡的所在。空間語藝在此可被界定為：在語藝實踐緊密連結時間與空間的前提脈絡下，勾勒出空間如何回應特定的脈絡情境並匯聚時間經驗，更在時間行進間打造未來空間的功能變遷和異質性，甚至體現或建構社會變貌的語藝部署。

本研究旨在推敲晚期 Bakhtin 自歌德教育小說中所提陳揭示的空間語藝觀與其時間／實踐性。首先，透過摸索 Bakhtin 如何從盛讚杜思妥也夫斯基複調小說的對話性，轉而婉言質疑其理想言說情境的困境，本研究指出「從自我到社會」、「從時間到空間」實乃晚期 Bakhtin 轉向歌德研究的理論脈絡。接著，本研究藉由批判性地閱讀 Bakhtin 論及教

育小說的經典專著，勾勒演繹其間的「時間匯聚」與「空間打造」之雙迴圈機制，及其所結晶醞釀的「時間視覺化」與「成長迸生性」之空間語藝觀。基於研究發現，本研究將指出晚期 Bakhtin 的思想實乃飽含階段性策略戰略思維的語藝洞察。晚期 Bakhtin 既有歷史感又有未來性的空間語藝理論，其最關鍵的意義，在於它確實將語言的社會改革與實踐性置於「對話」的位階之前或之上。

貳、Bakhtin 空間語藝觀的提出脈絡：複調小說的未竟之業？

晚期 Bakhtin 思想的空間語藝觀，主要啟蒙自其對歌德《義大利之旅》這部教育小說的空間分析。按照 Bakhtin (2004b) 的敘述，他對於歌德極力要從具體可見的視覺物件與物質現實基礎中，論證自然科學穩定世界觀的預設乃是偏頗不實的，印象深刻。而歌德饒富人文省思意涵的旅記，更多處彰顯、呼應，甚至是挑戰了 Bakhtin 前期的複調小說研究。

Bakhtin 的複調小說研究，最早以專書形式公開發表於 1929 年。由於 Bakhtin (1994d, p. 103) 將此書定義為「後設語言學」(metalinguistics)，旨在藉此將「話語互動乃語言的基本事實」放置於對話本身的場域中（而非在語言系統或靜態文本中）加以哲理化。因此即使 Bakhtin 研究者（劉康，1995，頁 182）主張複調小說研究的關鍵性在於其在 Bakhtin 思想體系中的縱貫融會（即納編了早期的主體建構論、中期的馬克思意識形態符號學研究、晚期的民俗文化節慶的狂歡風格），但事實上複調小說如何從後設哲學層面再探「自我與他者的對話性對於理想言說情境的誘發」，才是此時 Bakhtin 孜孜不倦的志業。

Bakhtin 的複調小說研究大致可從文類歸納學、文學社會學這兩個部分加以理解。以下將先探討複調小說如何不同於獨白小說和史詩，並在文類特性上展現小說主角／語藝言者的主體性，及其與作者／他人表述在對話平台上的「並置」、並駕齊驅。接著陳述當 Bakhtin 在 30 年代開始進行歌德研究之際，逐漸意識到複調小說所構築的文本時空應有一個更為歷史感的文學社會學脈絡，並據此重新省思複調小說縱有利基、更有圍限的語言事實。也正是在這裡，我們將清楚看見 Bakhtin 轉向歌德教育小說的心路歷程。

一、Bakhtin 論複調小說的文類風格特性

杜斯妥也夫斯基一度曾經是年輕 Bakhtin 眼中的英雄。因為從古典文學的傳統中，複調小說在文類特性上確實展現出難以抹滅的亮點。Bakhtin 首先勾勒出自古希臘時期以降至歐洲中世紀與文藝復興時期，共有三種主導的文類風格，分別是史詩、智辯士修辭（the rhetorical）和狂歡體（the carnivalesque）。不同於史詩透過頌揚存在於絕對過去（absolute past）且作古八股的教條主義價值觀、智辯士修辭好用「爭辯語藝」（polemic rhetoric）而非「對話語藝」試圖在捍衛既得體制利益的前提下進行非黑即白的雄辯倡議，源自於古典文學與希臘「哲學家語藝觀」的狂歡體，則以嚴肅與詼諧兼具的方式，一方面體現了主體意識與社會真實的未了性（unfinalizability），另一方面亦力搏封閉整全性的世界觀並開啟開放文本空間的想像投射（Bakhtin, 1963/1984, 1994e；亦見王孝勇，2014），往往令 Bakhtin 心嚮往之。而杜氏小說正體現了此種風格。

這裡我們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杜氏在年輕 Bakhtin 眼中的價值，

在於他積極地在文類歸納和對比中，放諸「語言符號在現實存在的限定框架中，如何反映和折射出主體意識的生成」（Vološinov, 1926/1986, p. 19），而這是 Bakhtin 語言哲學時期最核心的命題。此外更重要是，Bakhtin 欲透過杜氏自我標榜的「寫實主義」而非「浪漫主義」認同為起點，賴以推敲語言的文本時空如何對外指向現實世界，並成為促發社會變遷的具體標記。對此，Bakhtin 進一步將上述三種文類歸納簡化為複調小說 vs. 獨白小說兩種。這兩種文體的根本差異，可從以下兩段引文中敘述的複調小說主角性質、主角與作者的相對關係來看：

主角雖然是一個虛構的角色，卻被視為一個觀點、一個對世界與自我的看法。所以，我們……並非要去探索主角的特殊存在或其固定形象，而是「其意識與自我意識的整體」，最終，「成為主角對自己與其所處世界的最終看法」。亦即，組成主角形象的要素，並非真實本身的特質（例如：主角自身或其每日生活環境的特質），而是這些特質在主角本身與其自我意識中的意義。所有客觀特質（例：主角的社會位置、習慣、面貌、精神狀態），在 Dostoevsky 的筆下，都成為主角所擁有的內省及其自我意識的主題（Bakhtin, 1963/1984, p. 48）。

主角意識因此不再是處於主角之外，且於作者整全性的世界之中。主角意識是一個他人的意識。作者能做的，唯有將一個客觀世界與無所不包的主角意識「並置」，而這個客觀世界便是一個視主角意識與他人意識平等的世界。（Bakhtin, 1963/1984, pp. 49-50）

上述兩段引文對西方形式哲學主導的當代發展思潮，是非同小可的挑戰。因為不同於形式哲學典範雖就話語「形式」對於文本「內容」生產具有一定的影響，但傾向訴諸發話者／作者的預設和判斷仍具有主導

位階，Bakhtin 透過杜氏小說試圖揭櫫的乃是主體形構過程中的「多聲性」（multi-voicedness）與「多重中心性」（multi-centeredness；Booth, 1984, p. xxi）。更有甚者，論者指出就 Bakhtin 後設語言學的立場而言，言說主體在此更是某種「集合體」，而非率性而為、任意武斷的「言說個體」。據此 Bakhtin 所想像的「客觀世界」，實為「自由多元論」的人類生活隱喻（同上引，p. xx）。與之背反對立的，即是獨白小說的封閉世界觀。此外，在複調小說所揭櫫的主角意識及其與他人表述互動運作之際，某種語言的階層化（stratification）得以被烘托出來。它不是透過排除他者而生，而是不同主體意識互相交錯、重疊、「並置」於同一個對等又積極交往的共時空間平台（Emerson, 1984, p. xxxi）。Bakhtin 研究者直指這就是複調小說理想言說情境與對話性的體現（王孝勇，2014）。

然而，當 Bakhtin 於 1930 年間著手從文學社會學的角度重省複調小說的文類特性時，卻對上述他自己對於杜氏的崇敬愛好，有了不同的觀點。這樣的思路轉折，肇因於 Bakhtin 對於文本應物質性地（而非想像推論地）具有超越現存社會形勢的夢想驅動。吾人更得以從中清楚看見對話論的語藝困境。

二、Bakhtin 論複調小說的語藝困境

Bakhtin（2002）首先羅列出自歐洲古典時期以降，分別有希臘羅曼史（Greek romance）、每日生活的歷險小說（adventure novel of everyday life）、傳記小說（biographical novel）、民俗小說（folkloric novel）等依序居於文化的主導。更重要的是，每種不同的小說因其「時間與空間的連結關係」而對外體現為不同的政治想像和社會文化變

遷，更得以被轉化為鬆動既定僵化、開啟對話互動、營造未來願景的（視覺）文本分析與存在哲學批判基礎。而上第四種民俗小說時空型，因其得以貼緊在地風俗並進而鬆動僵化教條的旨趣，所以最接近 Bakhtin 的理想（王孝勇，2016b）。然而，Bakhtin（2004b）此時卻相當出人意料地宣示，杜氏的複調小說並非因其嚴肅喜劇性質而為民俗文化時空型，毋寧是上述第二種的「歷險小說」。⁷

歷險小說此一類乃自古希臘羅馬時期以來，盛極一時的小說時空型。從 Bakhtin（2004b）對歷險小說的社會分析中可見，當時歐洲社會看重的是「法庭—修辭的情感訴求」（judicial-rhetorical pathos）。這使得語藝實踐易流於非黑即白、濫情渲染。呼應此一說法的語藝歷史研究者更指出，羅馬以降乃至於中世紀語藝和第二智辯士時期，「非政治的主題」因其較不會觸怒當權而廣為流傳。語藝與民主的等同連結於是蕩然無存（Herrick, 2009）。在這樣的語藝情境下，善／惡、判決／辯護、指控／脫罪等二元僵化類目成為唯一的生存或語藝詭辯邏輯，人的形象乃至於主體意識最終僅能隸屬於超驗、先驗的法律暴力或既定規範。再加上時值基督宗教亟欲擴展勢力，透過散佈眾多「聖徒傳」（hagiographies）強調人必得經過重重折磨、誘惑考驗方通過輪迴的測試到抵彼岸，然而所謂的「透過折磨和誘惑來『測試』聖人」的宗教倡議敘事，本就預設了「主體的不變性」，亦即無論主角／聖人經歷多少

⁷ 這裡值得稍加注意的是，Bakhtin（2004b）在“The *Bildungsroma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Realism”一文中，將「希臘羅曼史」也納為「歷險小說」的其中一種次類目。這說法與先前的時空型文類歸納學將兩者區分獨立開來有所不同。Bakhtin 雖未明講此舉的用意，但從字裡行間看來，兩者因確並生於古希臘羅馬時期，所以在情節描繪、時間呈現，乃至於世界觀上，都有著相當的類似雷同。而更重要的是，兩者的類似雷同對比著歌德的「教育小說」，更顯差距異質。

險阻困境，他最終都必然會達到早已預先既定安插的終點，靈魂得到昇華（Bakhtin, 2004b）。法律與宗教論述兩股力量相加，Bakhtin 直指歷險小說縱使透過理想言說情境的勾勒試圖強調不同主體在「共在之境」的情意交流相濡以沫，仍「缺乏歷史在地性」。⁸ 影響所及，延續此一脈絡的杜氏的複調小說本身，事實上並沒有「明顯依附於特定的歷史紀元，或與特定的歷史事件和情境產生扣連」（同上引，p. 15）。Bakhtin 還加碼地說，複調小說「缺乏歷史在地性」的問題在最極端的狀況，將因主角和「世界」缺乏真正寫實的互動使然，不但日常性對話所內蘊潛藏的民主化動力將難以想像，外在真實亦成為了靜止定格的穩固實體：

⁸ 歷險小說作為 Bakhtin 將複調小說納入的文類分類，對其「缺乏歷史在地性」的指控看似有些不可思議。但若我們考量 Bakhtin 前後期書寫的旨趣差異，或可有所解釋。事實上，Bakhtin 在複調小說研究中，所欲攻擊的稻草人乃是古典馬克思乃至於西方形式主義哲學對於「所有語藝產物都充斥著意識形態」（Emerson, 1984, p. xiv）論點的拒斥。Bakhtin（1984）在肯認人類存在本身即是語言問題，而語言問題又必然出現多重中心和多音交響的對話交往之際，他於複調小說研究中再三強調的是行動者導向或語藝言者導向的主體論和世界觀。但於此同時，我們也看見 Bakhtin 在字裡行間坦白，透過主角自白所呈現的「對世界的說法」，可在個人真理與世界真理之間求得「藝術融合」（同上引，p. 78），更使得「意識形態思考變得情感地、親密地連結於『個人性』（personality）」（同上引，p. 79）。這個主張的魔鬼細節在於，個人表述「應」具有抵抗所有外在整全論的語藝動力，實乃座落於 Bakhtin 的推敲期待中。本研究認為，Bakhtin 於早期確實對於語藝實踐的民主化有所想像，而這樣的冀望乃是以主體論述、對話為本的意識形態理論再建構，並透過杜氏小說作為例說。但是，晚期 Bakhtin 改以基督教敘事中的「測試」僅是虛晃一招，它無法作為改變主體內在對話性的觸媒為例；或是法律論述變成與自我詮釋、內心自省、自我辯護無涉的道德旗幟，Bakhtin 試圖提出的，或許是複調性的自我意識彰顯在特定時空條件下雖有必要，但確實力有未逮。此刻我們需要另一種處理時空關係的方法，幫助語藝言者從一個相對虛構的想像空間（複調小說）進入到現實主義的物質空間（《義大利之旅》）。兩種手法並不矛盾衝突。惟其手法的差異在於，後者更還原語藝實踐在改變現實社會的此刻和未來世的積極意義初衷。據此可見，晚期 Bakhtin 對於「歷史在地性」確有自己的理解或新解。

世界無法「改變」主角，而主角也無法「影響」世界，他無法改變世界的樣貌。當主角歷經諸多試煉並且終於擊退敵人時，主角會將所有的東西留在其於世界中原本的位置。他不會改變世界的社會面貌，也無法將世界重新結構化，他更無法對世界提出聲明。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互動、人與世界之間的互動，這些問題都不會被提出。（Bakhtin, 2004b, p. 16）

我們該如何理解和思考 Bakhtin 的自相矛盾、前後不一？Tihanov（2000）的回應說得誠摯有理。他認為 Bakhtin 在複調小說時期所述的對話、眾聲喧嘩，乃是作為「個體」追求完美的工具，而不是「社會」理性化的手段。亦即，Bakhtin 透過杜氏書寫所提陳的，乃是每一個對話主體、語藝言者對於自己內在生命的敏感度，這是柏拉圖的問題意識延續，而非 Habermas 的思考路徑。誠然，透過 Bakhtin（1963/1984, p. 94）在複調小說研究中不斷提及杜氏嘗試透過諸多「想像（而非寫實）的對話」營造管絃樂一般互相唱和、熱鬧生機的情節敘事與主角形質，雖有意力搏過去古典主義、結構主義乃至於啟蒙運動的僵化世界觀，畢竟意在強調諸思想（ideas）、諸意識（consciousnesses）係肇因於日常語言交會之際的話語意識挪用。Bakhtin（1994e, p. 190）當然有藉著複調多聲性訴諸開放民主的「哲學立場」，並透過狂歡體創作與民間儀式的眾聲喧嘩示現複調、對話的未來性。但這個立場並沒有被放在真實世界、歷史進程等有血有肉的意識形態鬥爭地景中被理論化。據此我們可以說，Bakhtin 複調小說研究關懷的是「自我」而非「社會」。「從自我到社會」，則是後續轉向歌德「教育小說」的一個關鍵。

再者，Caryl Emerson 與 Holquist（2004, p. 57）試圖比較杜氏和歌德在創作中所流洩出的不同文本時空觀，發現前者傾向將不同的話語意識和階段（例如：過去、現在、未來時間的對話）視為「同時性」

(simultaneity)，並且將其加以戲劇化地並置或背反對立，塑造「單一時刻的交錯區域中，不同話語意識的互相連結關係」。這是杜氏的長處，更是日常語言運作的時刻常態。對此，當 Bakhtin 欲宣稱「日常生活中，回應與期待緊緊鑲嵌在每一個對話」(1994d, p. 108)，甚至「每個話語都是不同社會腔調的交錯與鬥爭」(1994f, p. 58)時，他必然借重仰賴杜氏。因為在那裡，小說中的意念、主體、觀念、思想都是互為主體的生活事件(live event)，生動活潑地坐落於一個過去、現在、未來交織結晶的對話平面或定點(1963/1984, p. 90)。這裡，Bakhtin 筆下的杜氏藝術意識，強調在共存和互動中持續創造話語意識的接合、挪用、實質共享和變化生成，以提陳其活化主體和自我的時間觀與世界觀。這樣的立場更引導著 Bakhtin 旋即在「時空型」研究中，直指「時間優先性」當為首要的文本空間研究基礎。

然而到了之後，Bakhtin (2004b, p. 28) 卻說對歌德而言，上述在同一個空間中並置不同聲音腔調的創作方式與分析架構，顯得太過「簡單膚淺」。Bakhtin 甚至引述歌德說過的「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那些並置的現象，我也無從處理他們之間的連帶關係，更無從彰顯其中的成長迸生與意識發展」(同上引)。對此 Emerson 與 Holquist (2004, p. 57) 指出，這是因為歌德一貫將所有現存的矛盾衝突「認知為成長迸生與意識發展的不同階段」，方能「從每個現在當下的開展示現中『見證』過去的蹤跡，以及更重要的，未來的趨勢」(同上引)。易言之，當吾人的視野從肯認複調小說對話世界確實體現了一個想像的社會象徵性平台，更進一步戮力去創造具體的地理歷史在地化和嶄新的時空關係，以圖瓦解文本與社會現實之間的界線鴻溝，那麼歌德所提陳的沒有任何一個生活事件或歷史事件得以被安置於同一個廣闊平面，而是必得要擴延至演化的時間序列中，並且親眼目睹(而非憑空想像或虛構)多

重時間性所留下的印跡步履，雖然乍看主觀定論，卻有其重大價值。

據此我們可以說，杜氏複調小說的語藝困境，在於其文本時空即使充滿複調交錯，實為歷史演進過程中的一個時間片段；相對於此，歌德從任何一個歷史進程所凝聚積累的空間出發，試圖見證目睹的乃是歷史長空的微妙律動運轉。在 Bakhtin 的歌德想像裡，任何一個透過目睹之眼所見的靜止空間和在地地景，都像是顆汨汨搏動的心，對現在當下的旅人共鳴著不同異質時序、⁹ 多重時間所沉澱流動、成長迸生的語藝空間性。也正是在這裡，Bakhtin 改從歌德的教育小說入手，在他早期針對話語對話性以及主體意識形構變動的基礎上，以更恢弘大器的筆調眼光建構空間語藝觀；尤其是其中透過「時間視覺化」所促發的「從空間看見時間」，以及「從空間預示未來」所必然立基的主體意識的「成長迸生」。

參、「時間視覺化」與「成長迸生」的空間語藝

Bakhtin (2004b, p. 25) 在歌德研究的專文，開宗明義地提到：「擅於在世界的『空間整體』中『看見時間』，另一方面又不會把空間整體視為靜止不動的背景，而是一個成長迸生的整體和事件」，乃是歌德位居世界文學翹楚的原因。Bakhtin 此番的宣示一方面呼應了他自「時空

⁹ 「異質時序」的概念對研究者正在進行的長期計畫而言十分重要。它可被界定為「與傳統線性延續時間絕對斷裂，與片段時間加以連結」（Foucault, 1986, p. 26）的時間觀。Saindon (2012) 更藉此概念用以陳述特定空間擺設如何從現下回顧歷史時空，並在言者與聽者之間產生實質共享的認同化效應，又得以「辯證地超越」現下空間的語藝條件限制，圖謀指向未來的替代性價值系統建構。本研究後續將從一個例子對異質時序的運作與空間語藝效應，提出初步的說明。而正文此處，則傾向暫時從一般性的角度理解異質時序不同於線性時間的特性。

型」研究以來即關注的視覺語藝，另一方面更意圖澄清歌德即便為文學家，但其掌握真實時間、與歷史進程同化的寫作立場，使其創作文字早已超越了單一文學範疇的價值意義，更底蘊著寫實主義的政治方案。對此，Bakhtin 給了我們這樣一段旨意磅礴且引人入勝的話：

在寫實主義的成長迸生小說中，人「沿著、伴隨著世界」而迸生，人反映著世界本身的歷史迸生。……這裡確切發生的，乃是新人類（a new man）的成長迸生。未來的組織力量在此顯得非常巨大，而這裡當然不是「私領域的傳記未來」（the private biographical future），而是「歷史的未來」（the historical future）。彷彿世界的「根基」正在改變，而人也沿著世界跟著在變。因此不難理解的是，在這樣的教育小說中，人類潛力、自由與必然性的問題都受到了重視。成長迸生的人的形象……開始進入一個全新的、歷史存在的「空間」領域。（Bakhtin, 2004b, pp. 23-24）

上述這段文字清楚交代了 Bakhtin 空間語藝觀的時間性與實踐性意涵，而這樣的特性則與「人類行動」與「歷史事件」所創發刺激的時間匯聚與空間打造雙迴圈，密不可分。

一、空間語藝的雙迴圈機制與時間性

首先，在時間匯聚性的部分，Bakhtin（2004b）指出歌德將歷史時間加以藝術視覺化的書寫，至今少有人能夠超越。這是因為歌德在認識論上相信無論是嚴肅的科學概念，或是隨興所至的主體內在經驗、外在感覺和自我反思，都可以被視覺化地呈現。但是 Bakhtin 在此特別強調的是，歌德將歷史時間視覺化的書寫並非流於粗糙原始感觀主義和狹隘

美學主義所訴諸的時間線性、封閉循環性或感官直覺，而是多重時間性，那是「在空間中看見時間」的秀異技巧和空間語藝視野，如同下面這段歌德在《義大利之旅》中的文字：

我們舉目仰望山上，無謂遠近，只見山巒起伏，沐浴在陽光下，時而煙霧繚繞，時而烏雲密布大雨傾盆，時而又被積雪覆蓋。我們總把這一切歸因於大氣的影響，因為所有這些變化和運動都可為肉眼所見。相反地，對肉眼而言，山巒的形狀總是看似靜止不動，看似死寂。但我長久以來相信的是，那最外顯的氣候變遷，真正肇因於山巒那內在幽微的、秘密曖昧的作用所影響。（Goethe, 1816/1962, p. 13）。

上述這段文字中，歌德試圖將「空間」裡具體可見連續事物填補上時間性，用以彰顯「看似靜止不動」、「看似死寂」的空間乃係散佈於不同歷史階段的拼湊組構，更是不同成長逆生階段所暫時凝結的律動變數（而非恆定不變的常數）。對 Bakhtin（2004b, p. 29）而言，歌德的空間假設在科學上是否成立並非重點要旨，關鍵的乃是歌德藉此提出了透過目睹之眼時時刻刻尋訪時間的「成長逆生視野」（*vision of emergence*），帶領了我們「回看」人類生活所有的可見符號都係與時間相干，實則持續地變化生成、改變震盪。Bakhtin 據此指出歌德空間語藝首要的機制，在於異質歷史時序匯聚於當下的運作軌跡。空間語藝的時間性，可持續演繹為以下兩點觀察和批判分析的依據：（1）過去與現在「必然」在持續變化生成的軸線中產生根本的連結；（2）過去具有「創造性的效果」（*creative effectiveness*），決定了現在當下的某些形貌，甚至是某種程度上預示了未來（同上引，p. 36）。

在過去與現在的必然連結性部分，Bakhtin（2004b）舉出的例子是歌德在西西里島的首都 Palermo 旅行參訪時，被導遊領到一個壯麗的河

谷旁，導遊接著開始仔細地描述此處曾發生的一場惡戰。歌德當下感到非常地厭惡，終於忍不住開口制止導遊。對他而言，導遊此舉將過去和現在加以機械性地等同類比，向是在向消失的幽靈招魂。而歌德恰好對於此種「疏離的過去」（the estranged past；同上引，p. 33）嗤之以鼻甚至恐懼憎惡，因為他認為從「消失的鬼魅」（同上引）中無法看到過去與此刻現下的有機連帶。對歌德而言，過去若缺乏與現代當下的必然可見的鑲嵌相繫（而流於想像懷舊的記憶召喚），它只是老死僵化的歷史遺跡，實則對當下的生活空間毫無啟示。Bakhtin 還說這個主張雖往往讓人誤解歌德「對舊時回憶漠然以對」（同上引）。其實不然。因為 Bakhtin 眼中的歌德，寧可好整以暇地沿著河岸蒐集小石頭，藉此回看、摸索前期地球地質的變貌。

在過去必然創造現在、預示未來的部分，Bakhtin 舉出的案例同樣是歌德在《義大利之旅》中的某一個小鎮漫遊經驗。當時歌德沿著大道開往特定小鎮，他透過目光所及推測這裡在三十多年前應該有位很有遠見的市長主政。因為沿路兩旁的綠色植栽、樹木草地的分布種植並非隨機，而是清楚透露出過去曾有個官方計畫性地栽種行動。Bakhtin（2004b, p. 34）說這裡展現出的時間視覺化和歷史時間觀，旨在陳述：過去必然是創造性的動態生命（而非食古不化的父親語言），它對於現代當下而言，肯定具有其效應——無論是正面或負面。更有甚者，Bakhtin 說由於在歌德的目睹經驗中，過去仍續存於現代當下且積極地活出色彩，我們更可藉此在某種程度上「預見」（predetermine）未來的在地、地景。如此方能獲致特定的空間語藝部署在回看歷史、匯聚時間之際，如何清楚地揭示此刻當下的過去脈絡，以及此一脈絡對於既定現實的創造和誘發，甚至據此投射、折射至未來的必然（寫實主義式、而非浪漫主義式的）光景。

綜上所述，上述對於「時間視覺化」、「時間匯聚性」此一部分雙

迴圈機制的概念化，在一定程度上延續 Bakhtin 複調小說研究中所揭櫟的個體意識透過在「共時性」中與過去、現在、未來的持續對話以形構主體性。但不同之處在於 Bakhtin 透過歌德所帶入的「歷時性」軸線，更得以藉由將空間的時間性賦予當下自我身分或認同建構的決定性力量，以創造一個嶄新的批判視野，亦即：時間中的人類主體、歷史事件的變化生成，將伴隨著人類存在「空間」的拓展（Tihanov, 2000, p. 235）。

在此，成長逆生的人類形象得以開始克服其私人性，並進入一個全新的、歷史感的、無限演化變遷的「寬敞空間」（Bakhtin, 2004b, p. 24）。於是，當我們從空間回看時間並進行主體自我認同建構的分析之際，這樣的分析必然不會是編年體、大敘事的重建，而是限定聚焦的、策略選擇的、特定社群意識的、異質時序與多重時間性的空間描述和批判。而「空間」凌駕「時間」之上的分析立場，則透過 Bakhtin 反覆提及的「視覺性母題」（motif of visibility）與其中的物質主義、寫實主義傾向，再次得到了確立。

事實上，在時間匯聚性的分析基礎上，Bakhtin 已經揭示出的放眼未來空間打造，亦屬其空間語藝觀的關鍵要素。以下這段被許多研究重複引述的文字，更凸顯出了 Bakhtin 對「地景新貌」（new landscape）的殷殷企盼與籌思擘劃：

我們必須要去找到一個嶄新的跟自然的關係，不是針對一個個體所擁有的小小世界角落，而是對這個大世界的根本本質，是對銀河系的所有現象，對從地心挖掘出的珍貴寶藏，對各式各樣的地址位置和大陸板塊取代，藉此替換那狹隘的田園詩集體性，一個新的集體性必然被建構出來，用以擁抱所有的人性。（Bakhtin, 2002, p. 234）。

加拿大重量級研究者 Michael Gardiner (2013) 直指，上述文字中 Bakhtin 試圖告訴我們的，已超越一般認為視覺觀看得以消弭主體 vs. 客體、具體 vs. 抽象、個體 vs. 集體之間的緊張關係或二分切割。Bakhtin 嘗試走得更遠，直至透過對視覺賦予解放性的使用，據以熱切地擁抱樂觀論的社會改造計畫與烏托邦論。這裡，Gardiner 舉證和論證的基礎，來自於 Bakhtin (2004b) 所標榜的歌德所述之在地性 (locality) 與地景觀 (landscape)。以下這段 Bakhtin 所援引的歌德在其自傳中的自白，清楚交代當「人類建造者」(man the builder) 和「創造性的過去」互相遭逢碰撞時，主體所目睹的地景，必然逐漸迸生未來感與實踐性：

有一種十分奇怪的感覺，完全湧上我心，那就是過去與現在融為一體的感覺。這種感覺把某種虛幻的東西帶到現在。它在我大大小小的作品中都有出現，而且總在我寫的詩中發揮影響力。儘管它在與實際生活界線混淆的時候，顯得怪異、難理解，甚至令人不快。科隆 (Cologne) 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古老的建築對我而言總有難以言喻的影響力。教堂的斷垣殘邊，有些現在重建中尚未完工的看起來像是遭到破壞，卻喚起了我心中對未來……的情感。(Goethe, 1974, p. 258)

Bakhtin (2004b, p. 34) 指陳透過上述引文，歌德帶給我們的啟發是，當我們回看空間的時間匯聚性之際，歷史的「創造性過去」除了必然要被納進在地化、人性化的空間地景中，更要以充滿未來感之姿「為人的創造行動而生、為人的未來棲息而存」。亦即，寫實主義的時間感所匯聚的空間語藝觀，必須迎向「清新的未來之風」(the fresh wind of the future)。由此界定的在地性和地景，意指空間部署或任何物質可見空間的切片 (piece) 必然因其充滿「人類行動」對「歷史事件」(同上

引, p. 21) 的「現在重建」、創意挪用, 方得彰顯其語藝效應、實踐性和政治發明。行路到抵羅馬, 是歌德義大利行的高潮。在那裡, 歌德的這番體悟, 促使 Bakhtin 對於人類主體改造空間、進而推動時代巨輪持續往前進步開展的語藝實踐動能, 有了積極的肯認表態:

這裡的生活已經持續了兩千多年, 並且在時代的遞嬗間, 發生了多次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至今還保留著同樣的土壤、山丘, 昔日的城垣和牆壁, 而人們則像過去還保留著古典的特質。每當此時, 你就彷彿成為左右命運的共同參與者, 而這使得你將開始發現, 要去了解一個羅馬如何接替另個羅馬, 乃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這不只是當代羅馬跟隨著古代羅馬, 而是一個世代紀元跟隨著另個世代紀元 (Goethe, 1816/1962, p. 20)。

也就是說, 歌德在目睹羅馬地景如何歷經歷史時間的更迭遞嬗之際, 不忘強調每一個歷史片段都飽含著指向未來的人類建構可能。這些不同歷史時間此番共同於在地性的地景中, 更刺激人類建造者「去創造某種更有意義的東西」(Goethe, 1816/1962, pp. 433-434), 據此揭示打造嶄新空間或異質空間乃必然性的倫理承擔。在此, Bakhtin (2004b, p. 23) 體悟到: 「人不再隸屬於時代紀元之中, 而是處於兩個時代紀元之間, 處於從一個紀元到另個紀元之間的轉捩點中」。而羅馬這個在歌德和 Bakhtin 眼中的「偉大時空型」, 其藝術史和人類史乃至於時間性機制, 係呈現聚焦於空間語藝場域並積極促發語藝動能的實踐性。地景更成為了「空間、時間與可目睹之人類行動之動態整體」(Tihanov, 2000, p. 241)、地景新貌和空間語藝實踐。也正是在這裡, Bakhtin 宣示歌德「用嶄新的目光再探既存的世界定義」(同上引, p. 244), 且更進一步於在地、地景中「彰顯時間的創意人性化與未來感」(同上引, p. 242), 帶領我們得以重新掌握田園詩中每個微小細節都有人類碰觸痕

跡的人文面向、「人性歷史」（Bakhtin, 2004b, p. 38）。至此，小說和史詩的界線得以被抹除拭去，甚至同為「新史詩」的空間語藝要素。因為新史詩在此，乃是「提供世界與生活的整體圖像」（同上引，p. 45）之濃縮示現和指向未來的結晶凝結整體。

二、空間語藝的實踐性綜論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透過歷史時間的匯聚，Bakhtin 彰顯出從現下空間回看過去的密度、物質性與改懸易轍；再加上打造異質空間的創意行動、倫理承擔與使命必達也定會出現在特定的語藝空間，且據此透過人的詮釋、部署而變得寫實可見。這樣的空間語藝觀在歷史脈絡的重建上，得以擺脫機械化、本質論的必然牽引，更得以在空間重塑的未來感營造之際，與宿命末世論分道揚鑣，據此建構主體意識的成長迸生。Bakhtin (2004b, p. 42) 因此自信地說：「這裡沒有死氣沉沉、沒有僵固不動、沒有石化之境、沒有不允許行動和成長迸生介入的靜態背景，也沒有裝飾布景」。

至此我們可以肯定的是，晚期 Bakhtin 確實已超越了複調小說乃至於先前的對話論，雖然彰顯出意義互動與主體形構的互相交錯，但畢竟在對話到對抗、意識形態鬥爭的轉折之際，缺乏相對應的理論說明窘境。在晚期 Bakhtin 的空間語藝觀中，現在當下的現實自我得以濃縮（時間匯聚）、凝聚（空間打造）為一個可見的新世界整體，並持續彰顯出異質面向和無限的前景。這一系列的空間語藝時間／實踐性一方面可謂替 Bakhtin 早期「意識形態環境」（ideological environment）觀點主張人類意識因意圖獲得社會身分的肯認而必然被諸多不同類目的客觀符號所環繞，但又得以「回過頭來」在既定集體的社會意識實踐中嘗試

克服現狀並重塑個體的政治意識 (Bakhtin & Medvedev, 1991)，做了「反唯我論」、「反唯心論」且內蘊歷史唯物論的理論補述；¹⁰ 另一方面更為關鍵的意義，則在不同於複調小說研究中對於始於人際互動的日常語言，得以在話語意識交錯的關鍵時機「對外」衍生、折射為意識形態鬥爭和衝突的對話論模型建構，晚期 Bakhtin 試圖大膽挑戰「對話」的位階，甚或不再視其為終極價值。Bakhtin 此番暗示的，乃是將社會改革與實踐性至於對話之前或之上。因此透過歌德的旅記分析，Bakhtin 揭櫫的是歷史長空流轉的緣起情牽和表述意義，當然不是處於僵化的語言系統中，更不僅僅是在對話互動的文本挪用中，而是就在對話互動本身的場域時空裡每一個充滿政治意識的辯證行動間。反過來說，複調和對話唯有在人類行動對歷史事件的時間匯聚詮釋和空間改造藍圖鍛造中，才得以清晰體現其不可化約的繁複多變。少了解放和干預政治的預設與方案，語藝實踐／對話的積極感與未來性終究看似月盈、實則虧蝕。

再者，不同於西方智識傳統中另個深受歌德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盧卡其 (György Lukács)，傾向將成長迸生理解為「自我創意實踐」和「客觀決定論」交會的那個核心點。但此一核心點在經濟決定論的模型下必然是囿限大於潛力動能，因此不但永遠難以達到平衡狀態；更有甚者，如此的成長迸生觀縱使看見主體行動力和協商妥協的矛盾本質常態，卻因過度強調社會現實的制約而僅能「暴露」現存的窒礙困境而非勉力「超越」 (Tihanov, 2000, p. 221)。對此，Bakhtin 早期對話論在

¹⁰ 這裡必須說明的是，Bakhtin 在意識形態環境的討論專文中，由於篇幅極短，因此文中的主張充滿了低度解釋性，缺乏對意識形態環境提出清晰的界定。但即便如此，我們仍可從字裡行間讀到 Bakhtin 此番的用意，乃是藉此主張「社會人」須透過周遭意識形態環境的中介而存在和發展 (Bakhtin & Medvedev, 1991)。而這是 Bakhtin 認定馬克思主義應關注卻未置喙的主題。

充分肯認社會辯證之際，終於在晚期的書寫中透過歌德，直指透過觀看的創意行動，得以在空間語藝部署的雙迴圈中實踐其改造社會的民主化動力。晚期 Bakhtin 此番力搏馬克思主義在不同時期或擁護者那裡雖有些許差異，但持續捍衛的辯證法和決定論，究竟是太過浮誇？還是胸有成足？

事實上，晚期 Bakhtin 的空間語藝觀在歌德小說的分析啟發上，試圖精密構築的，乃是人類行動處於歷史事件所積累變動的創意鏈結之中。所謂的歷史事件的積累變動，一方面意指小說整體的空間語藝背後，「站著一個大的、真實歷史中的既定世界僵固存在」（Bakhtin, 2004b, p. 45）。是故此番藉由與之相對或相較，Bakhtin 空間語藝觀的從空間回看歷史時間、時間匯聚性，本質上乃是一種策略性地、針對性地（addressivity）的語藝行動，試圖藉此將過去實際發生過的歷史事件轉化至今時今日的文本時空。也正因為歷史事件在這個轉化中被適時鬆動了其沉積遺跡的石化根本與事實／史實性，因此所謂的「時間視覺化」基本上是在外在時空與情境制約框架之「內」，協商建構另個較為活化人性的異質空間。當主體的成長迸生在此首次出現時，Bakhtin 更以歷史演化序列的不穩定性、多重時間存在的必然性，揭櫫這一回合的歷史回看乃係飽含策略戰略思維與審時度勢盤算的語藝洞察。這樣的語藝洞察並不意在脫離或分離既定沉積的歷史時間序列，而在策略性地依附於其間與之周旋。

接著在小說已然逐漸鬆動既定規範、歷史事件並轉化烘托出初步的異質空間之際，Bakhtin 轉而透過強調小說世界之「內」的地景在地化與未來感，方為真正彰顯未來人性尊嚴、血肉存在、全新時空，甚至是國家歷史（national-history）的空間語藝實踐。據此，成長迸生的真切未來，實乃再次經歷了第二回合異質空間化的打造鍛鍊。從這裡望見的

教育小說時空與其中的主體形象，乃是雙重異質化（double heterotopia; Saindon, 2012）或歷經兩階段轉化變遷的空間語藝實踐。Bakhtin 更進而將其空間語藝觀的雙重異質空間打造，簡要綜整為以下七個時間視覺化的模式特徵。本研究認為，前四點講的是第一階段的歷史脈絡重建與活化，後三點揭櫫的是從異質空間到雙重異質化的空間語藝未來性實踐：

(1) 時間（過去與現在）的融合；(2) 在空間裡，時間視覺化的完整性與清晰度；(3) 「事件的時間」及「其發生的特定地點」的不可分割性；(4) 時間（現在和過去）可見的「根本必然」連結；(5) 時間（存在於現在中的過去，以及現在本身）創意的、主動積極的本質；(6) 介入／貫穿時間的必然性，以及用空間連結時間，和不同時間彼此之間的連結；(7) 在必然性的基礎上佈滿在地時間、將未來含括納入，在歌德的意象中實現時間的完整性（Bakhtin, 2004b, pp. 41-42；標號為本研究所加）。

Bakhtin（和歌德）上述空間語藝觀的揭露與七點策略指引方案可謂創造其畢生志業的登峰造極，更有助於吾人用以規劃或分析任何具有解構批判意識的社會行動語藝。本研究擬以「同志包括 LGBT」論述的跨性別解讀（transgender reading），初步試析上述架構的分析應用性。¹¹

¹¹ 本研究以臺灣同運社群所生產的「同志包括 LGBT」為例，並從跨性別的觀點進行檢視和批評，主要是因為「同志包括 LGBT」論述的成長滋生，乃是觀察同運與跨性別運動彼此間競合關係的範例，其中更可看見跨運在同運大傘下被排除的雙重異質化狀態。尤其在臺灣語境中，因為過去數年聚焦推動婚姻平權實為同運的首要戰略，這也使得同運越來越往異性戀單偶制和真愛（恐性、恐跨）論述的方向走，此舉對於同運中相對邊緣的聲音和主體，確有排除效果。這裡，跨運如何對同運的論述生產進行時間匯聚的省思批判，又如何據此尋覓未來更為專屬限定的空間打造方案，這些提問和觀察符合本研究的理論關懷，也是本研究現階段

三、從一個例說再看晚期巴赫汀空間語藝觀的應用價值

臺灣於 2003 年臺北同玩節活動中，正式形成了同志遊行的雛形。當時同運喊出的口號除了有「看見同性戀」，還有「同志包括 LGBT」。「同志包括 LGBT」的主張基本上移植自美國 1960 年代「石牆事件」之前的同志文化語境。當時的同志酒吧文化中，跨性別與同志的分野雖然隱約出現，但兩者仍在相同的社交場合中共存，看見彼此的異同（陳薇真，2016）。其後，在臺灣同運和世界人權語藝接軌之際，「同志包括 LGBT」更有助於凝聚非異性戀性別主體共同的存在和語藝困境。在此時空環境所營造的，乃是當代臺灣社會正親眼目睹著從婦女權益到兩性關係、再到多元性別認同的時間匯聚。其間更透過諸如 2000 年的葉永鈺事件等層出不窮的校園霸凌悲劇，使得同運和稍晚出現的跨性別運動，找到根本必然和不可分割的戰略連結。因為對於同運而言，所謂「娘娘腔同志」或「玫瑰少年」在校園經常性地遭受暴力，已成為刻不容緩地性平教育議題；而對於跨運而言，葉永鈺的遭遇和許多年輕跨性別女性自我敘述的個人成長歷程和遭到性霸凌的經驗，有著驚人地類似重疊（何春蕤，2003）。

然而 21 世紀初期的臺灣社會，尤其在多元成家法案推動和婚姻平權因大法官宣示「民法違法」的前後，「同志包括 LGBT」的論述卻也

最能掌握用以解釋理論的個案（這裡強調一點，本研究現階段僅在進行理論的例說，無意也無篇幅就個案進行完整的分析）。而「跨性別解讀」則來自 Spencer（2014）對 Doty（1993）和 Slagle（2003）「酷兒批評」（queer criticism）的延伸。如果酷兒批評是對那些「非異性戀觀點」的文本進行正面解讀的觀點或框架，跨性別解讀則更在意的是仔細爬梳文本空間中的性別身分展演和性別認同跨越，而不只是性傾向。

引發跨運內部的擔憂，質疑差異被同化的表象多元性是否間接形成一種「施恩包括邏輯」（陳薇真，2016，頁 235），例如同性戀要接納跨性別，跨性別要積極參與同志活動等。

延續西方酷兒理論和社會經驗研究所述，跨性別的邊緣性（包括偏差性犯罪、自我傷害、自殺率）似比同志來得高（Meen, Gibson, & Alexander, 2010／葉宗顯、黃元彭譯，2012；Gagne, Tewksbury, & McGaughey, 1997）。跨性別在就診醫療、向家人出櫃以尋求替性別重建手術簽字背書等諸多難解困境，與多屬順性別（cisgender; cissexism）¹²同志的成長逆生差異甚大（Hancock, Stutts, & Bass, 2015; Norwood, 2012; Spencer, 2014）。再加上隨著一年比一年更為壯大的同志遊行在臺北、花蓮、高雄、臺中、新竹、臺東等地出現，以「愛」之名、陽光健康、單一伴侶、中產階級等價值觀也逐漸成為了同志社群和運動的主流形象；相對而言，跨性別則逐漸成為了同運「內部」被貶抑和邊緣化的群體（林淳得，2003）。

然而，跨性別雖在同運之內被雙重異質化，卻又無法斷然與之決裂。比方說成立於 2000 年的首個臺灣跨運團體「TG 蝶園」，於 2017

¹² 「順性別」一詞係指性別主體對自身的生理性（sex）、社會性別（gender）、性慾取向／性別認同（sexuality）採三者一致或部分一致的認同模式。例如「順性別異性戀男性」，則用來指稱生理男認同自己應／已具備男性氣質，且在愛情和性關係上傾向跟生理女產生慾望聯繫，這是前述所說的三者一致性。「順性別男同志」則指男同性戀者認同自己的生理男身體，而在性慾取向上傾向選擇另個生理男性。基本上來說，「順性別」此一詞彙乃是為了跟「跨性別」做出對比差異。「跨性別」係指生理性與社會性別（甚至性慾取向／性別認同）不一致者，具體外顯形貌則主要展現為變性（transsexual）與變裝（cross-dressing）兩種（但不限於此）。因此，當一個人是生理男且喜歡男性，並不代表他就一定是「男同性戀」，若他自我認同為女性，則是「跨性別異性戀女性」。不過針對這些名詞的劃分釋義，本研究主張應將其視為暫時穩定的類目建構，其間當然有彈性、開放性與流動的可能。

年臺北同志遊行後除了在臉書版上號召組隊參加同志遊行實乃不得不然的積極介入，因為要讓「上次沒辦法暢所欲言者，這次是專屬我們的隊伍」（見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tg.taiwan/?fref=ts>），同時又勉力更為主動積極地構思話語權和運動主導權的爭取，例如：「11月20日國際跨性別日是不是應該舉辦跨性別遊行？還是繼續參加彩虹遊行，等哪天同性戀玩膩了再看有沒有機會輪到我們從頭開始爭取權益？」（同上引）。對此，跨性別如何匯聚歷史事件的經驗動態，在內部被排除的語境中回過頭來重塑自我認同與未來的社會空間？

在歷史回看與介入／貫穿過去的部分，臺灣跨運的學界領袖何春蕤（2002）提出兵役制度、證件性別欄位、稱謂系統等諸多生活事件裡，都明顯可見對於跨性別社會空間的打壓和不友善。而這樣的性別盲點更可往上歸因溯源為「性別二分法」的肇因。此時頻繁出現的相關事件有2002年7月，跨性別女性蔡雅婷在變性前要求以女裝扮相作為身份證件上之照片，以便辦理護照出國完成變性，卻被戶政單位以照片不符當事人生理性別為由而拒絕；2003年5月，變性人林國華因為感到被社會排斥，以自殺結束生命；2011年1月，馬偕醫院解雇女裝上班的跨性別員工周逸人；2013年7月內政部認定吳伊婷、吳芷儀（均為改名後的姓名）這兩位跨性別女性在一人先變性登記為女、另一人維持男性身分時所登記的異性戀婚姻關係，在另一人也變性登記為女性後，將自動失效，理由是民法認定婚姻以一男一女為前提。

這些歷史事件進一步促使跨運既須接合於同運、又無法停滯於此。一方面跨運需要呼應同運，是因為像是吳伊婷、吳芷儀兩位跨性別女性成為彼此伴侶的情況，所在多有，因此迫切需要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另一方面舉凡稱謂自決權、性別自由廁所與公共空間的去性別化、X性別登記，乃至於「免手術換證」（亦即免經由絕育手術的器官摘除和重

建，即可更改身分證性別欄位）等較不隸屬於過去同運關心的主張，無法僅因為婚姻平權就獲得解套。對此，現階段臺灣跨運不同團體皆共同關注的免手術換證，或為下一階段再造臺灣性別友善空間的轉捩點。尤其是此一訴求除了扣緊過去和現在的世界進步潮流，使得臺灣跨運得以參照阿根廷（2012.05）、丹麥（2014.06）、馬爾他（2015.04）、愛爾蘭（2015.07）、挪威（2016.03）、希臘（2017.10）等國已通過的成功經驗，另一方面又拓延性別自決、尊重差異等修辭至跨運空間語藝的範疇內在，可說是最具未來感，又得匯聚歷史經驗的語藝實踐。此一訴求所濃縮、凝聚空間語藝的時間／實踐性，值得持續關注。而我們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跨運相較於同運，其間的對話到對峙並非線性的因果發展軸線，實則為異質時序的成長共生。透過跨運的雙重異質化處境與必然的振作奮起，我們方得以回溯性地目睹臺灣性別空間形構中的對話與複調。在此，特定社會運動的時間匯聚與成長共生現象或許一直都有，但透過 Bakhtin 空間語藝觀的視角調整，吾人至此不但不能再簡化籠統地看待一場社會運動的外在整體調性，而更得以透視其間恐怕必然體現的語言階層化與內在分化，及其隨之衍生的對話論與民主觀。

從上述例說再看 Bakhtin 的空間語藝觀，雖然按照 Bakhtin（2004b）的自我坦白和謙遜，他認為歌德在未來空間打造和建立新的歷史紀元的部分，仍稍嫌力有未逮。也就是說，「利用空間實際聯繫不同時間以打造未來的機制」（同上引，p. 41），在歌德教育小說中的書寫仍值得進一步地具體化。然而本研究認為，晚期 Bakhtin 的空間語藝觀得以一方面承襲過去對於日常性語言、對話語藝、存在主體如何內蘊改造政治社會的想像（例如同運與跨運在人權語藝照拂和性別主流化時空下的必然連結），另一方面又試圖藉由特殊的時空邏輯軸線具體而微地揭櫫更為優先關鍵的社會改革冀望與力道（例如跨運對同運既接合又

解離的路線重整），不但直指所有決定論都必然失去其奠基性，更藉由挑戰現代性的哲學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烏托邦論之華而不實，構築了 Bakhtin 與當代語藝民主之間的對話溝通橋樑。尤其是在部分語藝學者謀求斬斷傳統教條，卻又時刻積極擁抱古典並將其轉化挪用為未來語藝的重要基石時，晚期 Bakhtin 空間更重於時間的主張，確實提供了吾人凸顯語藝顛覆行動力和空間感的嶄新視野（Murphy, 2001）。

肆、代結語

西方語藝社群於 1998 年出版的 *Landmark Essays on Bakhtin, Rhetoric, and Writing* (Farmer, 1998) 一書中，編者曾經收錄了 1992 年原載於期刊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的紙上論壇。參與論壇的四位當代語藝學者皆在不同的問題意識和面向上，討論 Bakhtin 對語藝學「視批評為實踐、視語言為社會行動」（同上引，p. 97）的立場之可能啟發。首先，部分論者指陳 Bakhtin 對於言者表述必然回應情境需求、依境而生的對話論，雖然無法百分之百確信就是語藝情境（*rhetorical situation*; Bitzer, 1968）所述的脈絡對語藝實踐的召喚、誘發和限制，但是 Bakhtin 的字裡行間確有對於語藝空間性的揭示以及語藝必然指涉特定空間的主張（Bialostosky, 1998）。若缺乏這個認知，則無論是 Bakhtin 研究者或是當代語藝批評，皆「與形式主義無異」（Zebroski, 1998: 122）。

再者，也有論者（Bernard-Donals, 1998）從語藝批評的認識論著手，主張不同於古典語藝學模型中對於確定性知識（邏輯學）vs. 偶然性知識（語藝學）的二分，Bakhtin 透過日常生活中語言事實的直觀分析，試圖貼近物理物質世界，卻又不棄置情境的語藝建構性。這點除了

破除了極端社會建構論者宣稱所有身分認同都是虛幻不實的立場，更有助於就語藝實踐的歷史包裹進行情境化的折衷分析。Bernard-Donals（同上引，p. 109）更以「物質主義語藝」（materialist rhetoric）命名 Bakhtin 的思想（尤其引述的是他 1920 年間和晚期的著作，而非複調小說理論），係在肯定 Bakhtin 在直觀現象世界時空性的基礎上，更試圖進一步地回看當下空間的表述和人類主體的歷史建構歷程；而由於歷史建構本身的易變性質，因此語藝實踐所體現揭橥乃至於回應、打造的（過去、現在、未來的）空間脈絡，必然充滿張力和社會變遷的蛛絲馬跡。

呼應這個「空間兼具物質性與建構性」（Bernard-Donals, 1998, p. 110）說法，Halasek（1998, p. 113）從價值論、方法論的角度出發，主張語藝批評不應再侷限於語言片段效果的討論，而是務求探討「不同語言片段彼此產生關連性後的整體累積綜效」（及其中的異質時序拼貼）。這樣的空間語藝分析在「共時性」的脈絡中得以瞥見向心力 vs. 離心力的對話與對峙，更可將其展延至「歷時性」的變化生成軸線，據此洞悉折射語藝文本的「生命史」（同上引，p. 103）與未來性。

上述觀點雖各有側重偏好，但不同論者皆肯定 Bakhtin 思想體系中的空間語藝觀確實對於當代語藝學和人文批判理論的發展，有所啟發和貢獻。這點與過去語藝傳統經常性地將焦點置於時間、時機所開展的論辯主張雖無判然立決的高下，但確有差異（Arendt, 1993; Blair, 1992）。事實上，晚期 Bakhtin 的空間語藝觀將語藝論述等同溝通理性與社會現象的政治立場，雖源自於小說話語此一媒介平台，卻直指在特殊文類風格和文學長成的脈絡背後，實則存在著普遍性的文化原則。這樣的文化原則體現於空間語藝動態啟動的雙迴圈機制，乃時間匯聚與空間打造這兩條互為配搭的軸線。前者試圖從現下空間回看時間，並藉由

時間視覺化的語藝條件，目睹歷史時間如何棄置裂解傳統的線性時序，建構異質時序或多重時間性。這樣的時間回看匯聚更讓下一階段的空間打造，亦即從此處空間預示未來，有了明確的主體成長迸生潛力。

對此我們可以說，晚期 Bakhtin 似乎在某種程度回顧、延續了杜斯妥也夫斯基。因為當我們將過去既定陳舊的時間時序或時代經驗置換移轉到眼前當下，以創造出不同於穩定真理、超驗真實、絕對主義的異質空間時，所有日常性的認同與身分皆化身為超越單一個體意識範疇的共在之境、實質共享和對話互動。此種互為主體性的對話語藝觀實乃杜氏複調小說所鍾情纏綿的語藝時機。然而我們也可以說，晚期 Bakhtin 確實勉力而為地嘗試突破杜斯妥也夫斯基較為中性客觀化的對話論。因為空間語藝第一階段的时间視覺化立場除了揭棄日常性對話必然要回應特定脈絡的需求事實 (Montesano, 1995; Pauley, 1998; Scott, 2006)，更意圖藉由與既定時空持續往返凝視的認同化過程，底蘊著重塑政治社會的實踐意識與行動方案。在此，晚期 Bakhtin 極具活潑動態與人文思辨性的空間語藝觀不僅是一種在語言中確認實踐有其價值的修辭性表述，更因其獨具放眼可預示未來並與之周旋協商的野心企圖和政治動機，而得以優先優勢地將現實實踐摸索為具體圖像的批判語言類型。我們甚至可以說，晚期 Bakhtin 最大的意義在於他確實將語言和空間語藝的社會改革與實踐性放置於「對話」的位階之前或之上。Bakhtin 此舉意在創造另個共在之境、活化律動，甚至專屬獨到、秀異特殊的平行時空和「如真世界」(VirtuReal; Marciano, 2014, p. 834)。¹³ 在此，所有既定僵化

¹³ 本研究此處所借用的「如真世界」概念，來自性別研究者 Marciano (2014) 針對以色列兩個跨性別線上社群使用者如何在虛擬世界中建立性別與自我認同的分析。按照 Marciano 的說法，部分將網路使用視為日常語境之外的「替代性場域」(alternative space)。此舉不但允許「虛擬的同在感」(virtual togetherness)，也賦權了跨性別使用者。Marciano 於是將跨性別使用者所創造的線上世界，視為

的話語意念，或者唯我唯意志論的主體腔調，都只是歷史長空的某個偶然片段、地景切面和話語物化（word-thing），僅此而已。

參考書目

- 王孝勇（2009）。〈掙脫語言的枷鎖？從 Mikhail Bakhtin 論「表述」談起〉，《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30: 203-244。
- 王孝勇（2011）。〈Mikhail Bakhtin 狂歡節概念的民主化意涵：從批判取向論述分析的理论困境談起〉，《新聞學研究》，108: 183-223。
- 王孝勇（2012）。〈Mikhail Bakhtin 的對話主義及其對批判論述分析的再延伸：以白玫瑰運動為例〉，《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40: 149-202。
- 王孝勇（2013）。〈從對話到對立的民主化實踐—Mikhail Bakhtin 對話主義的理论轉折與政治方案之初探〉，《臺灣民主季刊》，10(3): 1-39。
- 王孝勇（2014）。〈眾聲喧嘩即倫理實踐：從 Mikhail Bakhtin 的語藝觀談起〉，《中華傳播學刊》，26: 137-173。
- 王孝勇（2016a）。〈從小說話語看眾聲群像：評介巴赫汀之《對話的想像：四篇論文》〉，《傳播研究與實踐》，6(1): 271-288。
- 王孝勇（2016b）。〈Mikhail Bakhtin 「時空型」概念的視覺語藝意識與實踐之初探：以 2014 年台北同志遊行為例〉，《中華傳播學刊》，30: 143-178。
- 王得宇（2016）。《時空體與對話性：董啟章《自然史三部曲》研究》。政治大學社會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何春蕤（2002）。〈認同的「體」現：打造跨性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6:

「如真世界」。這個詞彙一方面反映出它提供賦權的虛擬經驗，以彌補跨性別在線下世界裡的社會弱勢（例如：就算動了性別重建手術，也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生理女」）；另一方面也透露出線上時空仍然從屬於線下世界諸多規約限制（例如性別二分法）的事實。從 Marciano 的研究反饋 Bakhtin，我們可以說空間語藝回看歷史和建構未來的雙迴圈機制，本就是集體性的裂解僵固認同、開創語藝時機的行動方案。更有甚者，吾人透過這樣的行動方案，得以進一步回溯性地反思日常性對話、存在事件中的諸多窒礙難行確係歷史偶然的結果。在此，批判視野的情境化（且不只是對話性），在晚期 Bakhtin 大器恢弘的筆觸書寫裡，更顯得暮鼓晨鐘。而此一手法與複調對話論，雖對於對話的優位性有不同的主張，卻並非互相否定或取代，而毋寧是更為彈性的語藝實踐和空間語藝批評的選項類目。

- 1-43。
- 何春蕤主編（2003）。《跨性別》。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林淳得（2003）。〈網路酷兒再現娘娘腔〉，何春蕤（編），《跨性別》，頁 221-282。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 陳長房（1994）。〈西方成長／教育小說的模式與演變〉，《幼獅文藝》，80(6): 5-16。
- 陳薇真（2016）。《台灣跨性別前史：醫療、風俗誌與亞際遭逢》。新北：跨性別倡議站。
- 葉宗顯、黃元鵬譯（2012）。《發現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新北：韋伯。（原書 Meen, D. T., Gibson, M. A., & Alexander, J. F. [2010]. *Finding out: An introduction to LGBT studies*. London, UK: Sage.）
- 劉康（1995）。《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臺北：麥田。
- Arendt, H. (1993).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NY: Penguin.
- Bakhtin, M. M. (1984).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C. Emerson, Tran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3)
- Bakhtin, M. M. (1984). *Rabelais and his world* (H. Iswolsky, Trans.). Indianapolis,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5)
- Bakhtin, M. M. (1993). *Toward a philosophy of the Act*.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Austin Press.
- Bakhtin, M. M. (1994a). Aesthetic visualizing of time/space: The chronotope. In P. Morris (Ed.), *The Bakhtin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of Bakhtin, Medvedev, Voloshinov* (pp. 180-187). London, UK: Arnold.
- Bakhtin, M. M. (1994b). Carnival ambivalence: Laughter, praise and abuse. In P. Morris (Ed.), *The Bakhtin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of Bakhtin, Medvedev, Voloshinov* (pp. 206-226). London, UK: Arnold.
- Bakhtin, M. M. (1994c). The banquet, the body and the underworld. In P. Morris (Ed.), *The Bakhtin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of Bakhtin, Medvedev, Voloshinov* (pp. 226-244). London, UK: Arnold.
- Bakhtin, M. M. (1994d). The heteroglot novel. In P. Morris (Ed.), *The Bakhtin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of Bakhtin, Medvedev, Voloshinov* (pp. 102-112). London, UK: Arnold.
- Bakhtin, M. M. (1994e). The serio-comical tradition of the Menippea. In P. Morris (Ed.), *The Bakhtin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of Bakhtin, Medvedev, Voloshinov* (pp. 187-193). London, UK: Arnold.
- Bakhtin, M. M. (1994f). Language as dialogic discourse. In P. Morris (Ed.), *The Bakhtin reader: Selected writings of Bakhtin, Medvedev, Voloshinov* (pp. 48-61). London, UK: Arnold.
- Bakhtin, M. M. (2002). Forms of time and of the chronotope in the novel: Notes toward a historical poetics. In M. Holquist (Ed.),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 (pp. 84-258).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Bakhtin, M. M. (2004a). From notes made in 1970-71. In C. Emerson & M. Holquist (Eds.),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pp. 132-158).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Bakhtin, M. M. (2004b). The *Bildungsroman*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realism. In C. Emerson & M. Holquist (Eds.),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pp. 10-59).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Bakhtin, M. M., & Medvedev, P. N. (1991). *The formal method in literary scholarship: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ical poetics*. Baltimore, MD: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Bernard-Donals, M. (1998). Mikhail Bakhtin, classical rhetoric, and praxis. In F. Farmer (Ed.), *Landmark essays on Bakhtin, rhetoric, and writing* (pp. 105-111).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Bialostosky, D. (1998). Bakhtin and the future of rhetorical criticism: A response to Halasek and Bernard-Donals. In F. Farmer (Ed.), *Landmark essays on Bakhtin, rhetoric, and writing* (pp. 111-117).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Bitzer, L. F. (1968). 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1, 1-14.
- Blair, C. (1992). Contested histories of rhetoric: The politics of preservation, progress, and change.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78, 403-428.
- Booth, W. C. (1984). Introduction. In C. Emerson (Ed.),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pp. xiii-xxvii).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Doty, A. (1993). *Making things perfectly queer: Interpreting mass cultur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Emerson, C. (1984). Editor's preface. In C. Emerson (Ed.),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pp. xxix-xliii).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Emerson, C., & Holquist, M. (Eds.). (2004).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Farmer, F. (Ed.). (1998). *Landmark essays on Bakhtin, rhetoric, and writing*.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Foucault, M. (1986). Of other spaces. *Diacritics*, 16(1), 22-27.
- Gagne, P., Tewksbury, R., & McGaughey, D. (1997). Coming out and crossing over: Identity formation and proclamation in a transgender community. *Gender & Society*, 11(4), 478-508.
- Gardiner, M. E. (2013). *Weak messianism: Essays in everyday utopianism*.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Goethe, J. W. (1962). *The Italian journey* (W. H. Auden & E. Mayer, Trans.). London, UK: Collin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16)
- Goethe, J. W. (1974). *Goethe's autobiography, vol. 2* (J. Oxenford, Tra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lasek, K. (1998). Starting the dialogue: What can we do about Bakhtin's ambivalence

- toward rhetoric. In F. Farmer (Ed.), *Landmark essays on Bakhtin, rhetoric, and writing* (pp. 97-105).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Hancock, A. B., Stutts, H. W., & Bass, A. (2015). Perceptions of gender and femininity based on language: Implications for transgender communication therapy. *Language and Speech, 58*(3), 315-333.
- Herrick, J. (2009).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rhetoric: An introduction* (4th ed.). New York, NY: Hope College.
- Holquist, M. (2002a). *Dialogism* (2nd e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Holquist, M. (Ed.). (2002b).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Marciano, A. (2014). Living the virtureal: Negotiating transgender identity in cyberspace.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9*, 824-838.
- Montesano, M. (1995). Kairos and kerygma: The rhetoric of Christian proclamation.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25*, 164-178.
- Murphy, J. (2001). Mikhail Bakhtin and the rhetorical tradi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87*(3), 259-277.
- Norwood, K. (2012). Transitioning meanings? Family members' communicative struggles surrounding transgender identity. *Journal of Family Communication, 12*, 75-92.
- Pauley, G. E. (1998). Rhetoric and timeliness: An analysis of Lyndon B. Johnson's voting rights address. *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 26-53.
- Perlina, N. (1988). A dialogue on dialogue: The Bakhtin-Vinogradov exchange (1924-65).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Journal, 32*, 526-541.
- Saindon, B. A. (2012). A doubled heterotopia: Shifting spatial and visual symbolism in the Jewish museum Berlin's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98*(1), 24-48.
- Scott, J. B. (2006). Kairos as indeterminate risk management: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s response to Bioterror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92*, 115-143.
- Slagle, R. (2003). Queer criticism and sexual normativity: The case of Pee-Wee Herman.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5*, 129-146.
- Spencer, L. G. (2014). Performing transgender identity in *The Little Mermaid*: From Anderson to Disney. *Communication Studies, 65*(1), 112-127.
- Tihanov, G. (2000). *The master and the slave: Lukács, Bakhtin, and the ideas of their time*.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ološinov, V. N. (1986).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 Matejka & I. R. Titunik,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29)
- Zebroski, J. T. (1998). Mikhail Bakhtin and the question of rhetoric. In F. Farmer (Ed.), *Landmark essays on Bakhtin, rhetoric, and writing* (pp. 117-125).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Farewell Dostoevsky? Mikhail Bakhtin's Late Writing on Spatial Rhetoric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ime Politics/Emancipatory Politics

Hsiao-Yung Wang *

ABSTRACT

This paper elaborates upon Mikhail Bakhtin's late writing on spatial rhetoric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ime politics/emancipatory politics. First, it explains why and how Bakhtin contradictorily evaluated the dialogicity of Dostoevsky's polyphonic novel, especially the failure to model the so-called ideal speech situation. Herein, the standpoints of "from the self to the social" and "from time to space" might serve as the rhetorical resources for Bakhtin's turn to Goethe during the later period. Second, it outlines the two revolving rings of spatiality in Bildungsroman, which proceed from "recollecting the past" to "foreseeing the future" on the basis of visibility and "vision of emergence." Therefore, Bakhtin has temporarily been substituting his previous research concern on polyphonic novel with spatial rhetoric, which sets up the rhetorical agency in phas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mportance of Bakhtin's embodied spatial rhetoric is indeed its subscription to the primacy of resistance and rhetorical practice over dialogue.

Keywords: Bakhtin, emergence, spatial rhetoric, Bildungsroman, transgender, polyphonic novel

* Hsiao-Yung, Wa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Mass Communi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